

贵州省优秀科技教育人才省长专项资金项目

陈永霞 著

C H E N Y O N G X I A

清季民国时期贵州文化的变革

——以人物为中心的研究

陶渝芬◎主编 贵州大学贵州文化研究院『书不尽的贵州』丛书



贵州大学出版社

Guizhou University Press

“书不尽的贵州”丛书总序

□ 陶渝芬

曾几何时，贵州在世人面前，是荒凉、是边鄙、是蛮夷。其实，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史长河里，贵州从来不曾沉寂，她是一片热土。

甲骨文中有“鬼方易亡祸”的记录。春秋时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便包括了牂牁。汉为威镇南越，欲向夜郎借雄师 10 万，西南夷里“最大”的大国形象，留在了司马迁《史记》里。楚将庄蹻远征黔滇，循江而上，兵至且兰，贵州成了连接楚滇的东西交通枢纽，《史记》与《汉书》都有重笔描绘。《后汉书》为她书传了南方民族中最早的英雄——竹王。此后李白为他煮酒赋诗，王阳明叹天下山聚贵州的雄奇，徐霞客生生地为她创造了“峰丛”的地理景观名词，晚清大儒郑珍赞美自己的家乡为山国。书不尽的贵州，不断向中原展现神奇土地上的瑰丽。

书不尽的贵州，在于她山高、水长、林深、多民族聚居，更在于她创造的五彩斑斓的地域文化。我们不以某一特定符号去框定贵州文化，那样将掩盖她的多彩魅力。她是山国，有山的脊梁的铮铮风骨，又何尝没有山月弯弯映松杉的柔美和长水的款款深情。这里有“耕田，有邑聚”的古老部族，同样有“江南陌上草青青”的秀美农耕文明，富饶丰足也“比同中州”。上古通往印度的楚滇商道贯穿其间，串联着中国古老的南方黄金之路。汉代牂牁江流出的枸酱孕育了黔商，今天赤水河的茅台酒则是黔商对世界的奉献。这些就是黔商文化辉煌的见证；这里诞生了阳明心学，一代



学人在此崛起，他们汇成了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贵州交响曲。书不尽的贵州，在于她胸襟开放。蜿蜒盘旋在崇山峻岭中的北盘江、都柳江、清水江、乌江自古就是民族荟萃的走廊，各民族南来北往，在这片土地上汇聚、生息、创新。今天星罗棋布在黔山秀水间的各民族山乡村寨，正在经历着新农村建设，既延续着古老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又开创着时代的新生活。

贵州文化研究院植根于贵州悠远深厚的历史文化土壤，用我们近乎虔诚的心灵去体贴和感受她幽深、神奇而多姿的魅力，却又不失理性的智识，去追问她的源头；关注今天仍然延续着、赋予我们以智慧的历史文化传统，更因困惑当下社会发展中的种种难题，为了塑造未来的贵州梦，将依然激励着我们的那些历史文化资源，用心理解，用真情表达出来。这些理解与表达，是对贵州文化发展的经验思考，是从历史文化出发对社会经济发展中当代问题的观察，也是为后人留下的一笔学术积累，更是对明天的一种启示。以上就是我们的诉求。

贵州文化研究院“书不尽的贵州”丛书，就是上述根本诉求结成的文本。各文本作者力求用畅晓明白的文字，真实的史事，回望历史，思考当代，让今天的人们在阅读中感受到贵州历史悠久而不荒凉、边远而不边鄙、虽为“蛮夷”但开放而创新，是一片历史深厚、文化神奇的热土。

2013年4月

目 录

绪论：大风起于青萍之末·····	1
------------------	---

新学开拓篇

一、经师而兼人师，二百年无此文宗——贵州新学启蒙者严修·····	18
近代国家教育改革大趋势·····	18
严修事业中的个人因素·····	20
改良科举制度·····	23
筹办官书局：引进新的出版事业·····	28
改革学古书院：贵州最早的新学堂·····	30
余论·····	34
二、忆当年披星戴月，看此日飞云卷雨——西学践行传播者柏格理·····	36
基督教与近代中国文化转型·····	36
柏格理文化传播的多方因素·····	39
创办新式教育：石门坎光华学校·····	41
创制老苗文：苗族最早的适用文字·····	45
改造原始文化恶习·····	46
发展其他现代文化事业·····	49



政治文化革新篇

三、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文化变革的开启——张百麟与贵州辛亥革命·····	60
20 世纪初年贵州政治社会及张百麟·····	60
自治学社创办及其政治观点·····	63
自治学社的立宪及革命活动·····	67
大汉军政府的民主决策·····	75
余论·····	78
四、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文化变革的落实——吴鼎昌在贵州·····	80
来贵州前吴鼎昌个人能力历练·····	80
摆正地方与中央关系·····	84
理顺省政府与下级行政机关关系·····	87
科学处理各生产部门关系·····	93

教育文化革新篇

五、莫辜负今朝盛会，作砥柱中流——周恭寿与贵州官办教育·····	102
兴办官立学堂与学校·····	104
创办贵州第一所女子师范学校·····	107
推动贵州近代体育事业发展·····	109
余论·····	111

妇女解放文化篇

六、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贵州妇女解放运动先驱白铁肩	118
光懿女子小学堂	119
同旧文化传统做斗争	122
积极参与社会事业	123
余论	124

文学艺术变革篇

七、揭开黑幕，放大光明——话剧倡导者黄齐生及达德学校	132
社会大学毕业的戏剧家	133
黄齐生与达德学校	135
戏曲现代化的首次尝试：川剧《大埠桥》	139
达德学校的话剧创作	142

文化传媒变革篇

八、发行日报，举指导社会之实——周素园与贵州的报纸事业	152
中国报刊的时代及周素园的个人成长	152
创办贵州第一份日报：《黔报》	155



九、惊人之伟举：贵州现代化出版业的创立——华氏家族与文通书局··	160
捐赠、投资贵州文化事业	161
印刷业的变革：创办文通书局	163
创办永丰抄纸厂及文通书局图书部	166
发展成全国性的编辑出版企业	168

科技文化革新篇

十、惟内外宏愿既同，只有尽力做——黄千夫与贵州科技文化发展··	179
第一个自然科学团体创立：算学馆	180
主持实业兴办	184
创办《贵州实业杂志》	187

十一、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贵州西医奠基人邓光济与岩濑妇佐···	191
创办省立医院	192
开拓贵州现代妇幼保健事业	195
开展现代医学学术活动	197

十二、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

——贵州地质事业开拓者乐森璿、罗绳武	199
乐森璿首次对贵州的地质勘查	200
罗绳武及其抗战前的地质勘探开拓	201
抗战时期的共同奋斗	203

培养地质人才	206
罗绳武继续服务桑梓	207

学术文化革新篇

十三、于乡邦文献，尤所系怀——任可澄与贵州民国方志	216
清末民国修志高潮	216
参与兴办新学	217
主持《贵州通志》的纂修	219

十四、科学虽然没有国界，但是科学家却是有祖国的

——浙江大学在贵州	227
东方的剑桥：浙江大学在遵义的发展	228
带来科技文化	231
撰著独树一帜的地方志：《遵义新志》	234
民主堡垒：提升抗日文化	236
提升遵义教育文化	240

十五、集体的王阳明前来贵州开展文教工作——大夏大学在贵州

输送大量新型人才	247
贵州首次系统开展民族学、社会学调查研究	251
新文化建设与宣传	258
对贵州教育的贡献	261

绪论：大风起于青萍之末

1840年的鸦片战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封建专制帝国的古老国门，使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社会开始了由传统中国向近现代中国的艰难转型，这个转型其实也就是中国由传统文化形态向近现代文化形态的变革。它使延续了数千年，建立在封建经济基础之上，以儒家思想观念为主导的封建专制封闭性文化面临着冲击与解构的危险，同时也使建立在近现代经济基础之上，与近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相联系的自由、平等、开放的近现代文化成为中国的必然选择。这是从近代开始的中国社会生活全方位的转型，是包括经济形态、政治面貌、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全面变革，是实现中国近现代化的转化过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个转化过程到今天也远没有结束，虽然这个漫长的过程在中国已然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我们这里关注的是鸦片战争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百余年间，贵州在这一文化大转型过程中的因应情况。

中国传统文化近现代化

“文化”是一种复杂的现象，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其内涵与外延在不断地演变、扩展，以致在今天，有人在专门研究“生态文化”，即文化并非为人类所独有、所垄断，自然界中也有自身固有的内在价值，也有自己的文化和文化形式。另一方面，文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在不同的语境中，“文化”的侧重点并不相同，由此难以对其下一个公认的定义。1952



年，美国人类学家克鲁伯和克拉克洪合著了《文化：关于概念和定义的检讨》一书，统计了从1871年到1951年80年间关于文化的定义，共有164种之多。当今有人统计，古今中外关于“文化”的定义竟多达300余种。本文是在比较宽广的含义上使用“文化”一词，相当于文明涵盖的范围，从文化的属人角度来看，包含人类社会有史以来体力和脑力劳动所创造的全部物质的、精神的成就。

文化具有时代性，奴隶社会文化不同于原始社会文化，资本主义社会文化与封建社会文化有霄壤般的差异。文化也具有地域性，自然条件、社会发展程度及人文传统的不同，会形成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文化。在历史上，由于生产力低下、交通不发达等原因，世界处于封闭状态，文化的地域性特征比较明显。15世纪以后，随着世界新航路的开辟，西方资本主义率先发展，逐渐形成了强势的现代西方文化，并在其形成的过程中就已经开始了或主动或被动，或全部或部分地向世界各地扩张渗透的过程。这一文化既与中国文化存在于不同的地域，也与中国文化存在着时间落差，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传统文化的近现代变革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以西方现代文化为标杆的。

中国传统文化的近现代转型有一个从被动到主动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伴随着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与对西方文化逐渐深化的认识而进行的。明末清初中西文化曾第一次碰撞，但中国最终放弃了与之平等交流的机会，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文化再次强势来袭，这次再难形成规避的高墙。同时，以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提出为标志，国人对“西学”及西方开始形成现代观照，主动放下身段探索西方世界。但是，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以洋务运动的兴起为标志，中国人才真正将学习“西学”落到实践上。戊戌变法时期，学习西方文化已然进入高潮，维新志士樊锥甚至提出“唯泰西是效”的观点。

这是一个必然的历史选择，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不管有多少不能拽着头发离开地球的痛楚，甚至当下对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界定仍然莫

衷一是，成为被探讨的课题。当年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之路是以西方为楷模的，现代化几乎等同于西方化，当时已经建立起强大工业体系的西方也的确在整体上比古老的中国先进，两者处于不同的发展时代，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自然而然地借鉴融合西方文化资源形成自己的新文化，从而使自己具现代性，在某种程度上，这具有时代的合理性。

在中国文化由传统文化向近现代文化转型的过程中，除了“西学”一词外，还出现了“新学”一词。尽管中国对“西学”的认识有一个逐渐深入的过程，但“西学”的涵义一直还比较确定。它与“中学”相对，指欧美 16 世纪以来的近现代文化，是西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总称。16 世纪末期，随着西方文化第一次传入中国而得名。中国近代“新学”一词则出现于 19 世纪末期，其内涵较复杂，也有一个衍变的过程，并不能与“西学”等同划一，即便其很多种涵义均与“西学”有一定关系。在中国近代的历史语境中，最常见的便是将“新学”等同于“西学”，例如当时的张之洞便说“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①。本文接受的观点是“新学”与“旧学”相对，是晚清学术思想的主流，是中国学术文化发展的一种新的历史形态，即“在鸦片战争以后，西学东渐，在中华民族危机加深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传统文化在融会西方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的学术文化类型。简言之，晚清新学是中国社会近代化的产物，是中国的近代化形态”^②。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新学”由“西学”引起，并以“西学”为学习的内容，而不是以其为唯一的构成内容，“西学”传入中国，必然中国化，有着中国式的解读与中国资源的融入及创造。

① 张之洞：《劝学篇·外篇·设学中》，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年版，第 94 页。

② 闽都文化研究会编：《闽都文化与中国现代化》，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 年版，第 15 页。



国家文化与地域文化

在幅员辽阔的中国，贵州地处西南一隅，信息闭塞，远离中原主体文化中心，直到明朝才作为一个完整的省份正式纳入封建中央集权统治体系。到了近代，同整个国家一样，作为一个边远偏僻的省份，同样沦落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境地，地域的传统文化同国家文化一样走上了学习借鉴西方，从而走向近现代文化转型的征程。以 1895 年严修正式视学贵州并首次积极主动在贵州进行新学传播开始至 1949 年，贵州近现代文化变革的历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自 1895 年至 1920 年贵州“民九”事变为止是第一阶段。这段时间贵州产生了第一代新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清末民初的舞台上，这些拥有不同立场的新式知识分子，展示了近代贵州文化觉醒的活力，将贵州的发展与民族国家的危亡联系在一起。他们首先在政治文化的革新方面做出了巨大成就，在辛亥革命与护国运动中，他们均处于国家文化革新的前列，积极参与或推动了民族国家事务，同时对贵州封建性政治文化的铲除做出了阶段性的贡献；其次在各个方面启动了贵州文化的革新，包括教育文化、媒体文化、科技文化及社会生活习俗文化等。这一阶段尽管血雨腥风不断，但也是贵州本地人最活跃、最自觉地进行本省文化变革的时期。从 1921 年至 1935 年蒋介石中央军入黔为止，是贵州近现代文化变革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贵州文化的变革少有创新，但在某些方面有一定程度的扩展。封建军阀的连年战乱，使得贵州经济在此期间没有得到发展，农业基本停滞，整个民族资本主义仍然处于产生和初步发展时期，由此并没有提供一个可以进行文化革新环境；同时，贵州人的视野却更加开阔，更多知识分子出省或出国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在政治文化的继续革新方面，在校学生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同时，20 世纪 30 年代，红军也为贵州带来了革命文化。而教育、科技等则发展缓慢。第三阶段是 1935 年中期国民党开始统治贵州到 1949 年国民党统治的结束。这一阶段是贵州近现代文化确立并蓬勃发展的时期。贵州被纳入国家统治及战时统治的轨道，在资产阶级政治文化确立的同时积极发展资本

主义经济，推动各项文化事业的积极变革。

同沿海地区相比，贵州地域文化建立在更加落后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其近现代化转型仍然具有某些地域性特征。

首先，现代化之于当下的中国，仍然是正在进行时，但现代化之于中国，是有一个大致起点的，一般以洋务运动为开端。对于贵州来说，这个起点大致在戊戌变法时期，由时任贵州学政的天津人严修发起，他传播新学几乎形成全省规模，造就了一批具有新学基础、影响贵州的新式知识分子，因此同国家文化开始转型的起点相比存在“时间落差”。

其次，正因为存在文化变革的时间落差，贵州文化开始变革的领域同国家文化开始转型的领域也不尽相同。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一文中论述了国家文化的近代嬗变：“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这种感觉，从鸦片战争后渐渐发动，到同治年间借了外国兵来平内乱，于是曾国藩、李鸿章一班人，很觉得外国的船坚炮利，确是我们所不及，对于这方面的事情，觉得有舍己从人的必要……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自从从日本打了一个败仗下来，国内有心人，真像睡梦中着了一个霹雳，因想到，堂堂中国为什么衰败到这田地，都为政制不良，所以拿‘变法维新’做一面大旗，在社会上开始运动，那急先锋就是康有为、梁启超一班人。”^①正如梁启超所论述，从全国范围内来看，基于鸦片战争时的外国侵略者“坚船利炮”的威力，以洋务派主导的文化变革是从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开始，贵州文化的变革赶上了梁启超所论述的制度上的变革，但在“变法维新”阶段，贵州还只是处于在教育制度方面进行思想启蒙、培养新式人才时期，同全国范围内变法维新的宣传与实践还有一段距离，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20世纪初年，贵州文化变革起始的制度文化变革才从更广泛的层面上真正铺开，在一定程度上落到实处。

再次，清季民国时期，在内忧外患、战乱频仍的艰难环境里，贵州文

①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8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3页。



化同整个国家文化转型同样步履蹒跚。在这个基础上，贵州文化现代化转型内部存在不均衡现象，虽然整个文化发展滞后，但某些文化领域的变革却出现了位列国家文化变革前列的现象，被人称为“耀眼的光芒”，例如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护国运动等，贵州均跟上了国家文化变革的步伐。同时，这种不均衡性也表现在地域上，文化的现代化变革主要集中在贵阳、遵义、安顺等某些城市和地区，广大的乡村及绝大多数少数民族地区仍然按照旧有的生活方式生活着。

另外，客籍文人或群体对贵州文化的现代化变革仍然起了重要作用。黄万机在其研究中指出：“从西汉到清末二千余年间，贵州文化的发展走着一一条艰辛而曲折的道路，恰如在险峻的山道上跋涉，时而履步高山，时而涉足深谷，荆棘丛生，举步维艰。回忆这段曲折起伏的历程，我们不难发现这样的现象：凡是黔中文化发展较好、较快的时期，也正是本地文化与外地文化（主要是以儒家为代表的汉文化）交流频繁，各民族间和睦相处的时期。黔中文化的发展，与历史上几次大的汉族移民及外籍文人入黔游官、游历和定居有很大关系。”^①这一现象在近代仍在延续，很多时候，往往是客籍文人发动，黔籍人士参与，共同努力，尝试进行文化改革。例如严修学古书院改革、林绍年派遣留学生、抗日战争时期吴鼎昌的各项治黔举措等。

研究贵州清末民初文化变革的意义

位于云贵高原东南部的贵州，全省境内山脉纵横，占70%的地面为山岭地带，仅30%的地面为谷地的狭小平原。今天，在贵州境内的高速公路上飞奔，会发现很多路段往往完全是由很高很高的高架桥与很长很长的隧道相连而构成，在远处的某些山头上，偶尔会有一些具有民族建筑风格的村寨一晃而过，不禁让人在惊叹现代科技威力无比的同时，感叹古代贵州

^① 黄万机：《客籍文人与贵州文化》，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4页。

人在这万山丛中生活的艰难。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文化，历史上，贵州给予外界的印象是蛮荒瘴疠之地，欠发达、欠开发是其标签，自建省以来，“全省赋税不如中州之一大郡”，财政入不敷出，要靠湖广、四川“协济”，以致到了今天很多贵州人似乎仍然底气不足，在无形之中更扩大了隐性存在的某些成见。

大量的有关贵州历史文化的研究都在探索贵州贫瘠落后的原因。在农耕文明占主导的古代社会，贵州“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的特殊地理境况，“惟尔贵州，远在要荒”的历史地理区位，使得交通运输不便与信息闭塞，这里便成了相对隔离、先进科技与交流难以眷顾的区域，这是其长期停滞与落后的主要原因。同时，在历史上，贵州文化的发展呈现一种潮起潮落的发展态势，据研究，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在于：“它远离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只有当中央把视线关注到西南时，贵州才显得重要。”^①于是贵州获得一些发展的机会，特别在“明、清两代，大规模向贵州移民，开发人手猛然增长，加大了开发力度，扩大了开发范围”^②，正是在中央政府政策的扶持下，贵州与内地的差距逐渐缩小。但是经过五百多年的开发，贵州仍然没有能够达到如同内地的发展水平，只是从贵州的纵向发展来看，已经有了长足地进步。

两次鸦片战争，贵州不似东南沿海地区那样直接受到列强炮火的侵袭，国家对贵州的贫瘠也是一向体谅有加，特批其享受“协饷”，即便国家有沉重的对外战争负担，直到1901年前，贵州也并没有为之承担，但是这些并不能保证“天高皇帝远”的贵州免遭鸦片战争的波及。鸦片战争同样给贵州带来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19世纪70年代之后，贵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日趋明显。首先社会经济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外国输入洋纱、洋布、化妆品、金属用具等各种商品，并在贵州收购艾粉、桐油、五倍子、

① 史继忠：《贵州文化解读》，贵州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

② 张幼琪、史继忠、王萼幸子：《贵州：开发引出的考量》，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38页。



茶叶等原料和土特产品，甚至在甲午战后输入资本，贵州一些传统的农副产品及畜牧产品也进入市场。这些变化表明，贵州封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已经开始解体，半封建的社会形态正在形成，资本主义性质的商品经济成分在社会上占有一定份额，逐渐在向近代社会迈进。同时，鸦片战争之后，鸦片种植、吸食、贩运的情况十分严重。1897年，贵州年产鸦片4万担，为全国第三的产出鸦片大省，位居年产12万担的四川、8万担的云南之后。罂粟的大面积种植，严重阻滞、破坏了贵州农业的正常发展，使得清末民初农业经济更加滞后，并造成粮食匮乏、工业发展受限等越来越严重的社会畸形发展问题。其次，从政治上来看，自1845年天主教在中国弛禁以后，传教士陆续来到贵州，组成了一支特殊的侵略队伍。从1861年开始，贵州先后发生了青岩教案、开州教案、遵义教案等一连串的反洋教事件，引起贵州社会的动荡不安，但是同时也使贵州人事实上与外国人有了切实地接触，直接感知到国家遭受外来侵略所面临的深重危机。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贵州又迎来了发展的涨潮时期，不但在某些文化领域跟上了时代的步伐，而且有时还在整个国家文化范围之内一度超前。“近代贵州是贵州历史上最有声色、最富个性的时期之一。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文化，在近代贵州也以其鲜明的个性而影响当代和后世”^①，可以说，近代是贵州文化乃至贵州觉醒的时期，大批贵州人走出大山，努力融入时代也力图释放贵州人的影响力，事实上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大批来贵州的人努力尝试改变贵州，促进贵州文化的发展与进步；有更多的贵州本地人有意识地投身于的文化变革实践，力图通过改变家乡面貌，为地域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尽职尽责，以挽救民族国家危亡，为贵州在国家文化的发展中展示自己的存在感。

当然，近代贵州文化的变革并不尽如人意，在总体上看，在全国范围

^① 熊宗仁：《近代外来文化对贵州文化的冲击》，载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编《学者笔下的贵州文化 贵州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内与先进省区相比，它仍然是落后的，也并没有完成近现代化的任务。以经济的发展为例，抗日战争期间，是贵州发展的鼎盛时期，1942年的现代产业工人也只有三千人左右，可见工业现代化程度是非常低的。同时，文化上的变革往往半途而废，难以为继，仍然难逃潮涨潮落的历史命运。但是，近代的贵州仍然值得现在的人认真研究，无论是那些文化变革带来的耀眼火花，还是它逐渐黯淡下去的无奈。如果说在抗日战争时期国家又一次将关注的视线投注到了贵州，且有大量高素质难民涌来，文化革新突出表现在物质文化的进步；然而清末民初统治者无暇顾及贵州，也没有大批外来移民助黔，文化革新则突出表现在政治文化的发展。近代贵州这两次发展的高潮尽管由多种原因引起，但是也有共同的因素，在时代大潮的激荡下，贵州人开始觉醒，其内在的发展动力被触发起来，开始有意识地积极尝试文化的变革，这一点对于当今贵州的发展仍然是十分重要的。文化发展应该是贵州人自己积极主导下的发展，这样才可能真正迸发出创造的动力与持久的热情，否则，仍将是潮起潮落的重演。对今天已然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来说，近现代文化转型是至今尚未完成的一个过程，贵州同样面临继续现代化变革的现实诉求，怎样持久高效地发展是一个需要持续关注的问题。如果说近代贵州文化变革是起于青萍之末的微风，当下该是劲猛彪悍的文化变革大风刮起之时，历史的机遇不能失去，“贵州的贫瘠”不能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国家文化是一个国家中所有民族共同拥有的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精神风貌和文明程度的主要标志，是一个国家内在凝聚力的表现。相应地，即使如当下在很大程度上依然以省份为发展单位的中国，地域文化的发展也同样显示了一个地区社会发展的水平，人民的生活的丰裕程度及精神面貌。对贵州文化已有的研究中，往往是一种大视角下贯通古今的研究，作为对贵州研究的学步之作，本编力图在近代国家文化变革的大背景下，通过一些具体的人物研究，去把握在那个救亡图存的大时代里，贵州地域文化变革因应的状况、过程及实绩；也通过对历史的追寻，在贵州近代文化变革